

大同教传行中国始末*

雷雨田

巴哈伊教(Bahá'í)于19世纪产生于伊朗,原属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巴布教派,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宗教,信徒遍及220余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该教主张“神的独一、宗教同源”和“天下一家、人类统一、世界大同”,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大同教”。1924年,著名大同教传教士玛莎·露特在广州拜会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该教受到他的嘉许,为以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30年代,在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等人的倡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大同在教社”,专门翻译出版大同教的经典著作。由于该教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短,信奉它的中国人很少,1949年后大部分信徒流向海外,大同教在大陆可以说已经销声匿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根据一些外文和中文资料,将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作一梗概性的勾勒,期望学者对其进一步加以研究。

一、早期来华的大同教信徒

最早记载的生活于中国的巴哈伊教信徒是哈吉·米尔札·穆罕默德-阿里,他是大同教尊崇的圣祖——巴布教创始人巴孛的堂弟。他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是1862~1868年,1870年他定居于香港,经营中国瓷器生意。他的顾客中有伊朗的名流要人,如纳西里丁·沙等。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业活动包括出口茶叶、瓷器和金器。他曾在中国做了三个金银相框,捐献给巴哈伊教的圣地——以色列的海法,用来镶嵌大同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相片。从巴哈欧拉与他及其弟弟的一系列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将茶叶盒、茶叶、中国瓷器、蜜饯、肉桂、花种、眼镜等寄往圣地,在海法的巴哈伊国际档案馆里至今仍可看到部分物品。穆罕默德-阿里于1897年逝世于孟买。1881~1882年,巴孛的妻侄曾经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

1902年,阿卡·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和阿卡·米尔札·阿布杜·雅兹迪从俄属地土耳其斯坦的伊什恰巴德来到上海,在此建立乌米迪公司的进出口分支机构。巴哈伊教的圣护守基·阿芬第在1919年6月7日的一封书简中提到,在来自于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的一群朝圣者中,有一位名叫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的人。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曾经报道说:“上海在苏醒。中国人开

* 原载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始皈依,并把上苍之光传递给他们的同胞。”^①拉什提后来在上海逝世。

1910年,有两位美国的巴哈伊查里斯·M·莱梅和豪伍德·C·斯图鲁文访问了上海,拜会了阿卡·米尔札·阿布杜·雅兹迪。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巴哈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巴哈伊社团仍然主要由那两位最早来华经商的波斯巴哈伊组成。直到1914年波斯的侯赛因·乌斯库里与另外两位巴哈伊来到上海,才使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侯赛因·乌斯库里后来也将家眷带到了上海,他的家成了上海巴哈伊的主要聚会处和外地巴哈伊的造访之地,这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1931年,乌斯库里夫妇与其女儿、女婿苏来曼尼夫妇一起住在上海江西路451号。有数位中国人成了巴哈伊信徒,第一个上海地方灵体会可能在1928年就已经成立,其通讯地址就是乌斯库里的家。^②同期,香港的巴哈伊团体的通讯地址则是中国银行行长崔佩(音译)的地址。

乌斯库里对巴哈伊教的发展贡献良多。他是中国巴哈伊与圣护守基·阿芬第之间的主要联络人,1935年他曾到台湾为自己的进出口生意采购茶叶。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经访问过台湾的巴哈伊。作为一位知名的外国巴哈伊,他一直住在上海,直到1956年在此地逝世,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

二、早期华人巴哈伊

早年的记录表明,第一位中国巴哈伊是陈海安。他在美国名叫哈罗德·A·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求学,1916年6月离开这里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公法,1916年12月从旧金山乘船返回他的出生地上海。此前四五月份,他在芝加哥成为一名巴哈伊。他一皈依巴哈伊教,就以极大的热情推动该教的传播。他曾在的一封信中写到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时,在3000余名大学生中传播他新发现的福音,在返国前的一封信中表示要努力在上海建立一个巴哈伊灵体会。同年,安东尼·严·塞托(Yuen Seto)与他的夫人一起在夏威夷成为巴哈伊,塞托是夏威夷岛上的第一位华人巴哈伊信徒,也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巴哈伊。

1915年7月,世界著名的巴哈伊教旅行传教士玛莎·露特从日本横滨到夏威夷途中,曾在中国满洲里作短暂停留。她的护照表明,中国是她打算访问的国家之一。这是她首次进入中国沿海,但她在此是否进行了传教活动,没有史料可考。但后来的三次中国之行,却对中国巴哈伊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7年,11位波斯巴哈伊在上海聚会。主要经过阿卡·米尔札·阿赫迈德与拉迪·塔布里齐的努力,一本巴哈伊教的小册子得以出版,这可能是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巴哈伊书籍,它包含了巴哈伊教的十二大原则以及巴哈欧拉的继承人阿博杜·巴哈关于欧战之精神意义的解释节选。此前有位朝鲜人将其翻译成了中文。这本小册子亦曾以波斯文出版过,其中有阿博杜·巴哈的相片。1918年,阿卡·米尔札·阿赫迈德与拉迪·塔布里齐在哈尔滨又以俄文出版了一本阐述巴哈伊信仰的书籍。

① Jimmy Ewe Huat Seow, *The Pure in Heart*, Sydney, 1991, p. 25.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第2卷,第182、185页。

1919年,华人陈鼎模(音译)在美国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入教后极为热心,曾将许多有关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带回了中国,保存在上海的一个图书馆里。陈有幸收到过阿博杜·巴哈的一封信,鼓励他努力巩固他在上海所建立的巴哈伊灵体会以及在北京成立的巴哈伊灵体会,宣传巴哈伊圣道,并希望他转达自己对新近加入巴哈伊教的两位中国信徒的最诚挚的热爱与关心,相信他们将成为两支燃烧的蜡烛,将神光赐给中国。信中提到的北京巴哈伊社团,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那两位新信徒可能指的是陈海安,另一位则不知为何人。

三、玛莎·露特与早期的中国巴哈伊

在中国大同教的传播史上,玛莎·露特是一位关键人物。她是20世纪上半叶巴哈伊教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曾在20年间四次漫游全球,四次到达中国和日本,三次访问印度,并在南美的主要城市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向许多国王、亲王和他们的王后、共和国总统、大臣、出版家、教授、神职人员、诗人作家以及各阶层的人们宣示了巴哈伊教的教义和主张,正式或非正式地接触了宗教会议、和平会议、世界语协会、国家议会、神智协会、妇女俱乐部及宗法组织等。她8次拜会罗马尼亚女王,最终劝说她皈依了巴哈伊教。玛莎·露特四次来中国,接触了不少军政要员和知识界人士,其中包括黎元洪和孙中山大总统、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在百余所大学和其他学校及广播电台作过演讲,在当时刊行的中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内容涉及巴哈伊教、近代教育、世界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等。

1923年4月25日,玛莎·露特从日本大阪来到了华北,住了近一年时间,次年3月离开。这是她第三次访问中国,在北京曾住在平安坊里的一家英国女医生开的宾馆里。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巴哈伊活动,包括在近百所大中学校讲演和上课,参加公共集会,向许多要人和普通人宣传了巴哈伊信仰,其中有黎元洪的顾问。她在*English Standard*和*North China Standard*等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部分文章是中英文对照。她向许多中国大学生辅导和教授英文,曾两次在燕京女子学院,一次作为助教在北京世界语学校任教。她在北京的学生曾数次与圣护守基·阿芬第通信。为了有效地进行教学工作,露特曾经致力于中文学习,惜业余时间不多,她未能掌握这一语言。

在阿格尼丝·艾莉山大及其妹妹玛利的陪同下,露特广泛地在中国游历,她在日本的伙伴也来到中国与她会合,1923年11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巴哈伊灵宴会,并有记录可查。^① 她所会见的一位有影响的中国人是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包先生,包曾经在日本会见过艾莉山大。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得以在冯玉祥将军所办的一所军官子弟学校宣传巴哈伊信仰。她们会见的另一位中国要人是W. P. 陈先生,1920年他从包先生由日本带回上海的巴哈伊教的书籍上第一次知晓了巴哈伊信仰。应包先生之请,陈先生为报纸翻译了一些巴哈伊信仰的书籍。正是在陈先生的帮助下,露特和艾莉山大得以在北京的一次盛大的集会上进行演讲,并会见了邓洁明(音译),他后来接受了巴哈伊信仰。邓曾经向露特表示自己想在北平办一所巴哈伊学校,在露特离开中国以前就可以着手这项工作。在这所学校里,除一般课程外,还将教授世界语。

① Jimmy Ewe Huat Seow, *The Pure in Heart*, Sydney, 1991, p. 33.

在邓先生的陪同下,露特、艾莉山大和玛利于1923年11月25日离开北京,到东北地区旅行,他们访问了天津、济南府、曲阜等地,曾经在山东基督教学校作了演讲,后来又乘火车经南京到了上海,艾莉山大和玛利乘船去了火奴鲁鲁,露特则在上海待了两个半月时间。她对一系列团体作了演讲,其中有孔学会、神学家和世界语学者。她还在《上海时报》发表了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到武昌和杭州等地传播巴哈伊教义。1924年3月27日,她离开上海来到了香港。

4月初到香港后,她就开始忙于宣教活动,访问地方报纸的编辑、大学校长和图书馆员,会见一系列要人。她在此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香港电讯》特地为她发表了一篇社论,介绍她和她的巴哈伊信仰。她在香港大学演讲时,会见了印度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泰戈尔。此后,她又从香港返回大陆,到了广州,与人晤谈。不久,她返回香港,又到越南、柬埔寨等国游历,5月底到了香港,接着又乘船到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此期间,她不仅将巴哈伊信仰传到了中国大陆和香港,而且还传到菲律宾,因为这里出售中文报纸,上面有她写的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

六七月间,露特到达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并乘火车到达了珀斯,会见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巴哈伊信仰的圣辅克莱拉和杜恩。当地的一群华侨听取了她在图书馆学院作的“中国的伟大复兴”的演讲。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和惠灵顿,她作了同样的演讲,并有机会对当地的华民俱乐部发表演说。

露特第二次访华的最重大事件:一是在广州晋谒了孙中山大元帅;二是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士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关于玛莎·露特会见孙中山的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4日曾刊载过一则特别新闻《美国女记者游粤》:“美国新闻记者儒特女士,来粤游历,演讲巴哈的主义。兹闻儒女士,昨午十二时曾携带美国必智市长及该国工商部长介绍函,晋谒孙大元帅,陈述其关于世界和平的意见,并希望孙大元帅以中国和平民族的领袖地位,指挥世界和平运动,大元帅极为嘉许,畅谈至一时之久,始握手约再会而别云。”文中的“儒特”即玛莎·露特,“巴哈的主义”即巴哈伊教,原译为“大同教”。1930年9月露特女士再次访问广州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曾提及六年前孙中山接见她,“对世界兄弟情谊与合作的国际原则极感兴趣,表示‘愿用吾之生命换取全球之和平’”,并要求露特女士赠给他大同教的创始人——巴哈欧拉论国际和解的书。^①

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亲自接见大同教活动家并“极为嘉许”其有关教义,这显然是露特女士及该教所获得的殊荣和幸运,对大同教被中国人认同接受,将具有难以估量的特殊意义。露特女士也深知此次拜会的重要性,故在其演说和文章中,念念不忘传扬此事,既引以为荣,又以其作为传教的鼓动力量。事实证明,有孙中山先生的嘉许和榜样在先,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报纸、电台等,均为露特等大同教活动家大开绿灯,提供方便,特别是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仅在1924年一年时间,露特就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作了广泛的旅行,在近百所学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结识了不少政府高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界人士。她还是一些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将其中一些文章用中英文汇编出版。

另一件要事则是她结识了曹云祥。露特首次去清华时,并没有经过引荐,但却受到曹博士及其夫人的盛情接待。曹博士于191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曹博士的夫人艾

① 参见《新时代的国际教育》一文之编者按,载1930年9月9日《广州英文日报》。

琳·路易斯·海苓是一位美国人,她也在此期成了巴哈伊。在北京清华大学执教8年后,他们迁居到了上海,同这里的波斯巴哈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0年,露特在广州与曹云祥重逢。在谈话中,曹博士指出,在当时动荡的形势下,巴哈伊信仰特别适合于中国。他还引证孔夫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名言,说明巴哈欧拉临世的重要意义。

曹云祥后来将许多巴哈伊的经典翻译成了中文,其中有约翰·爱斯猛博士1931年出版的《巴哈欧拉与新时代》,导言为曹博士的晚辈钟可托牧师所撰,他对巴哈伊信仰和曹博士极为崇敬,赞扬了巴哈伊信仰所宣布的原则。曹博士本可为巴哈伊信仰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于1937年2月8日的车祸中罹难。次年,曹夫人迁居北京。在三年前,曹博士已经将阿博杜·巴哈的《已答之问题》的主要部分翻译成了中文,他的朋友T. Y. 唐为其作了修正。不幸的是,唐先生也于曹博士遇难后不久辞世。所以在1937年,沈义(音译)又补译了所丢失的曹博士该书译文的第39~44章,最终使该书得以在上海出版。

1923年,乌斯库里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里德万妮和阿里—穆罕默德·苏来曼尼作为拓荒者来到了上海,他们与乌斯库里的家人一起,为巴哈伊信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于1950年回到伊朗。后来他们于1954年10月22日到了台湾基隆,成为当地最早的海外巴哈伊。在他们到达之前,这里已经有了10位当地巴哈伊。两年后,台湾成立了巴哈伊地方灵体会。

1926年,受伊达·芬奇夫人宣教的影响,华人吉(音译)先生接受了巴哈伊信仰,芬奇是从日本前来辅助露特进行宣教工作的。吉先生曾经出版过一种杂志,但其巴哈伊活动不详。1933年,侯赛因·乌斯库里报告说,吉先生的弟弟也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1930年,玛莎·露特第三次访问中国,住了两个月。期间经过香港在广州停留了一星期,在广播电台上以及中山大学和中学作了演讲。在1930年9月23日的《广州日报》的长达两版的特别副刊上,她发表了三篇翻译的广播稿:《新世界语》、《作为普世语言的世界语》和《何为巴哈伊运动?》,上面还特地刊载了阿博杜·巴哈的肖像。在香港短短逗留期间,她主要致力于写作,曾经发表了30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她还会见了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国民政府主管丝绸业的官员廖崇真和他的妹妹为其担任翻译。陈将军曾表示,大同教的教义最适合当时战乱的中国。

从广州到达上海后,露特又与阿格尼丝·艾莉山大合,后者是特意从日本前来帮助露特进行宣教工作的。他们会见了曹云祥夫妇以及其他波斯巴哈伊。露特为当地的报纸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曾经连续8天刊载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史事。露特与阿格尼丝在上海花了10天时间宣扬巴哈伊信仰。露特还在南京逗留了10天,1930年10月6日在国立中央大学作了“新时代的国际教育”的讲演,出席演讲的少数女生对巴哈伊信仰的男女平等的主张深为激动。露特还在金陵女子大学作了讲演,并会见了不少政府官员。露特在上海和南京逗留期间,很少有机会在电台上演讲,这是因为国共两党的冲突日益加剧的缘故。据说,当时有10位巴哈伊住在上海。其中有曹云祥夫妇以及侯赛因·图第和乌斯库里一家,他们每两周在乌斯库里家里聚会一次。曹云祥博士自告奋勇将《巴哈欧拉与新时代》译成中文。露特推动了 this 工程,答应为其翻译出版募集款项。1930年10月22日,露特乘船离开上海,27日抵达日本。两月后返回夏威夷。据报道说,此期间许多中国学者成了巴哈伊,一些广东的巴哈伊将露特的文章译成了中文,并呈递给电台上广播。^①

① Jimmy Ewe Huat Seow, *The Pure in Heart*, Sydney, 1991, p. 41.



乌斯库里先生与曹云祥夫妇及其他友人

到1934年,上海的地方灵体会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当年,T. Y. 唐在一封通函中报告说,灵体会的成员由9人组成,曹夫人被选为司库,他本人是秘书兼图书管理员。

1937年6月,玛莎·露特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她从日本来到上海,住在专供外国人下榻的国际大酒店。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她冒着生命危险,为全国的有关图书馆和以前会见的朋友们运来了中英文巴哈伊文献。由于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所以她不得不于8月14日撤离。在随后的动乱中,国际大酒店遭到轰炸,多人丧生。她于8月20日到达马尼拉。

从1920年到1940年,许多巴哈伊宣教师访问了中国,包括米尔札·侯赛因·图第、法国的第一位巴哈伊希波里特·德莱掘斯-巴尔尼、圣辅凯斯·兰森基勒夫人、中国艺术史专家F. 圣乔治·斯潘德拉乌先生、著名的巴哈伊艺术家马克·托比先生、圣辅西格福里德·绍克福劳赫先生与伊达·芬奇夫人等。

波斯巴哈伊图第于1919年1月来到上海,1921年去了菲律宾。1927年返回上海,一直住到1946年。1932年他在日本东京会见了阿格尼丝·艾莉山大。巴尔尼从1920年开始在中国住了一年半时间。

基勒于1931年6~8月间在东京拜会了艾莉山大,8月间赴澳大利亚途中,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在电台上和其他场合合作过讲演。拜会了一系列著名的教育家和官员。廖崇真的妹妹廖凤龄(音译)^①小姐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为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邀请基勒访问广州,使基勒成了廖崇真博士家里的常客。基勒在两年间游历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后来去了波斯。

F. 圣乔治·斯潘德拉乌先生是加拿大人,他于1932年来到上海,留经游历南京和北京。1934年,在英国人博纳德·里齐的陪同下,马克·托比在上海拜会了老朋友邓魁(音译)^②,邓是一位艺术家,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时,托比曾向他学习中国的书法与哲学。邓魁向他传授的思想与风格影响了马克后来的画风。1934年5月11日,托比曾向上海的银行家俱乐部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历

① 廖凤龄,音译,应为“廖奉灵”。——编者注

② 邓魁,音译,应为“滕圭”。——编者注

史。在曹云祥的帮助下,他租用了中国青年会的两间房屋作为巴哈伊图书室。1937年该室关闭。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中国人聆听过巴哈伊信仰,一些人成了巴哈伊信徒。

四、战乱的年月

1920~1940年间,中国曾经派遣许多学者到海外留学,得到庚子赔款的资助。其中许多人应邀出席巴哈伊的活动,一些人皈依了巴哈伊信仰。阿博杜巴哈曾经回忆说,有一位同华盛顿和平会议有关的中国大学生出席了巴哈伊聚会,详细认真地请教了许多问题,最后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好的宗教。”另一位出身于中华民国领导人之家的大学生读了巴哈伊文献后感慨地说:“这正是新中国所需要的宗教。”

华人学者廖崇真,于1921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首次闻听了巴哈伊信仰,同年加入了巴哈伊。1923年春他回到故乡广州,帮助露特会见了许多中国的党政要员。在他的安排下,露特于1924年会见了孙逸仙博士,廖崇真担任翻译。曹云祥在其《中国的巴哈伊事业》一文中写道,孙中山听取和阅读了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后,表示巴哈伊信仰最切合中国的需要。在这次访问中,廖崇真的一位妹妹成了巴哈伊,给露特当过翻译。同年,在欧洲皈依了巴哈伊的T. J. 庄(音译)先生回到了上海。

廖崇真曾将一些巴哈伊文献翻译成了中文。1937年,他向守基·阿芬第报告说,经过五年时间,他已经认真完成了巴哈欧拉书简的翻译。他还将《隐言经》译成了中文,将圣护撰写的巴哈伊信仰的基本原则和简史印刷了2000册,寄往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在日寇对广州狂轰滥炸之时,他能够再次于1938年6月17日向圣护写信说:“在炸弹和子弹的轰鸣声中,我完成了巴哈伊重要圣典的翻译。具体说来,有《巴哈欧拉书简》和《已答之问题》,我现在正着手第三部书《阿博杜巴哈论神圣哲学》的翻译,因为我坚信新的世界秩序,世界的最终得救都取决于巴哈欧拉各种原则的实现。我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此喜讯告知我的同胞。”^①1939年,廖崇真完成了巴哈欧拉的《祈祷与默思》一书的翻译。

1939~1945年,在这战乱的岁月里,尽管通讯艰难,但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依然同圣护保持着通讯联系。在此期间,少数中国留美大学生成为了巴哈伊。有一位南京人楚耀龙(音译, Y. L. Chu)于1946年4月在华盛顿加入了巴哈伊教,当年6月返回南京,在上海拜会了乌斯库里先生、苏来曼夫妇、博尼丝·沃德女士和吉米·周佳三(音译)先生。朱于1945年8月17日在上海结婚后不日便携家眷迁居南京,在政府部门供职。他曾经向许多朋友宣讲巴哈伊教义,在他的引领下,他的邻居H. C. 元(音译)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1945~1949年期间,在美国克罗纳多州丹佛城受训的一群中国空军军官因同当地巴哈伊的接触并参加其聚会而加入了巴哈伊教,其中有大卫·栾奇(音译)、张铁力(音译)、吉米·周佳三(音译)、M. S. 元(音译)。1949年,上述诸人均去了台湾,他们可能是台湾的第一批巴哈伊信徒。

在美国加入巴哈伊教的著名华人希尔达·燕梅(希尔达·燕延星,音译)^②,于1905年^③生于上

① Jimmy Ewe Huat Seow: *The Pure in Heart*, Sydney, 1991, p. 52.

② 希尔达·燕梅,现统称为“颜雅清”。——编者注

③ 1905年有误,应为1904年。——编者注

海一个殷富的基督徒之家,16岁时,她作为大学文化交流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到美国施密斯大学留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受其叔父曹云祥的影响而了解了巴哈伊信仰。离婚后,她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使馆为其叔父曹云祥^①大使料理家务,她后来曾到柏林和瑞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时,她移居美国。1941~1943年间,她返回祖国,在重庆服务于抗战活动,她的父亲此时任蒋介石内阁的卫生部部长。1944年,她到了美国,次年在伊利诺斯州威尔梅特成为巴哈伊,在联合国公共情报部工作。任职期间,她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重要集会上代表巴哈伊发表演说,常常在巴哈伊和非巴哈伊聚会上引证守基·阿芬第的话。1949年,在纽约州成功湖举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她是巴哈伊四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1952年10月6~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五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代表大会上,她又是巴哈伊代表团成员,并任了大会第一工作委员会的副主席。希尔达于1970年3月18日辞世,她的长期挚友M·莫特海德夫人这样称赞她:“希尔达·燕梅将在未来中国巴哈伊的历史上占有永恒的地位。”^②

五、昙花一现的中国大同教

纵观大同教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和中国信徒的皈依,是在20世纪初期,到其在大陆消逝之时,仅有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其传教的范围、圣典的翻译出版、华人成员的素质等方面来看,可谓盛极一时。但由于中国政权的更替和大同教重要领导人的不幸倏忽离世等原因,大同教未在中国长期立足,实为憾事。但是,大同教在近代中国的传行,同与近代殖民主义相联系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大同教的传播,出于它本身也是一种在其母国受压制、遭迫害的宗教,所以其传教宗旨既不是为了在精神上征服中国,也没有仰仗殖民主义势力。早在百年前,大同教的第二任领袖阿博杜·巴哈就极为景仰中国及其人民,曾对其信徒说:“到中国去!到中国去!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最为诚挚……中国是未来的国家。”^③露特女士热诚坦率地对其中国听众说:“当我们西方还处于蛮荒状态时,你们中国这个杰出的民族就已经孕育和创造了许多文明。中国人有着敏锐的智力……我走了许多国家,还未发现比你们中国人更为文明、更有礼貌的民族。你们热爱自己的文化,发扬其精华;又研究西方文明,用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西方认为中国仍在沉睡,那么沉睡的便不是中国,而是西方!”^④在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如此同情中国人民,盛赞中国文明,并且预见到中国未来前途的西方人士,可谓凤毛麟角。没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和对中华文明的深切景仰,是不会持这种友好态度和宏大胸怀的,这同某些西方传教士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大同教没有专职传教士,它规定信徒皆有传教义务,所以它在中国的传教士也都是具有一般职业的普通人,如商人、学者和记者等。

正是由于大同教的传教士对中国人民所持的友好态度,同时也由于大同教的“世界大同”、“天下

① 曹云祥有误,应为“曹惠庆”。——编者注

② 《巴哈伊世界》第四卷,第431页。

③ 载1924年4月4日《中华民国日报》。

④ 载1924年4月4日《中华民国日报》。

一家”、“人类和平”等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念的类似性,所以它能够受到中国知识界的认同。这一点与其他外来宗教起初在中国的遭际是颇为不同的,大同教并没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冲突与磨合过程。在 20~30 年代中国的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时刻,大同教却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就是明证。

中国大同教的基本成员多是在海外受到高等教育的华人或归侨,有的担任过外交官,有的担任过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或高等技术职位,他们在大同教于中国的传播方面,特别是经典的翻译以及将其介绍给中国上层人士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随着这些骨干分子的倏然消逝或政局的更迭,大同教在中国也就骤然间失去了津梁,犹如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大同教问世于 19 世纪下半叶,此时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澎湃涌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它的创始人融各大世界宗教中最为普世和比较现代化的成分,提出了“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主张,呼吁打破信仰、偏见、种族、阶级、性别、语言、地域等界限,消除纷争,实现“人类统一、世界大同”,这确实是先进的人类长期以来所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再加上该教没有严格的教规和戒律。缺乏宗教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神论”和“来世论”的严密结构,所以就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缺乏芸芸众生在苦难中所需要的那种企盼苦尽甘来的精神慰藉,故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赞誉者甚多,而皈依者甚寡,真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它就不仅在中国信众寥寥,而且至今在世界上虽然传遍了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信徒人数却只有约 600 万人,比起其他那些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有效地融为一体的世界宗教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主旋律的今天,大同教却愈来愈显示了它的超前性和未来性,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中犹如鹤立鸡群,预示着这种宗教卓尔不凡的前景和生命力。